

## 新方向与老传统:辨析与互动

刘笑敢

唐君毅,20世纪中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新亚书院创办人之一,新亚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创系系主任,当代新儒学重要代表人物,在大中华地区和欧美学术界都有重要影响,并为很多中外学人所敬重和缅怀。为此,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于2009年前后,即唐先生百年冥寿之时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本刊第五辑发表了余英时撰写的唐君毅铜像铭,第六辑发表了余先生在铜像揭幕仪式上所作的录像致辞,第七辑发表了三篇有关唐君毅宋明儒学研究的论文,本辑则是纪念唐君毅专号。回顾唐君毅哲学研究的特点、贡献和局限可以再一次帮助我们反思和分析“中国哲学”这一术语、这一传统、这一领域、这一学科的特点、内容和方法。

本辑的特别专栏选录了五篇有关纪念唐君毅先生的致辞和演讲。第一篇是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央研究院”院士劳思光先生在唐君毅铜像揭幕仪式上的致辞,其中特别提到唐先生之“成德之学”即自我本身的转化问题有永恒之价值。的确,如果说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或以思想的历史研究为长,或以哲学之理论建构为优,那么唐先生则可谓以探索和实践儒家的圣德仁心为著。其学思与仁德泽被学子,情谊远及大洋彼岸,后面 Donald J. Munro(孟旦)和 Wm. Theodore de Bary(狄百瑞)教授的两篇讲词便是明证。孟旦回顾了唐先生早年对他的鼓励和引导,狄百瑞更将唐先生与朱熹相提并论,并希望将中国书院的传统引入现代教育。

接下来第四篇是劳思光先生在2009年5月“中国哲学研究之新方向:中大哲学系创系六十周年纪念、唐君毅百岁冥寿暨新亚书院六十年院庆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劳先生提出中国哲学研究有三种取向,这就是科学主义的取向、传统主义的取向,以及德行实践的取向,而唐先生治学的厚重之处就在于成德之学和工夫论,这也是儒学的特性所在。劳先生的分析既有跨越中西的宏观视野和理论背景,又有亲身的观察和体会,值得我们涵泳体察。最后一篇讲词来自于 Stephen C.

Angle(安靖如)在美国密歇根大学首届唐君毅讲座上的第三次演讲。这应该是第一个在西方以中国哲学家命名的讲座,亦可见唐先生在国际社会特有的地位和影响。安靖如的演讲基于对孟子思想的研究,探讨当代中国政治吸收传统儒家以民心为权威性标志并接纳现代个人平等观念的可能性与相关理论问题,比较详细地分析和批评了康晓光所主张的当代的儒家权威政治,建议接受牟宗三所主张的道德与政治适当联系和分离的主张。其思路清晰,分析细致,注重说理,反映了分析哲学训练之长,值得中国学者借鉴。

本期有七篇关于唐君毅与中国哲学研究的主题论文。第一篇是Thomas Metzger(墨子刻)教授的文章,他以唐先生代表中国哲学与西方近代以来的“现代西方认识论大革命”以后的新黑格尔主义相对照,指出西方认识论革命发展出对人类认识能力的怀疑和质疑,虽然由此产生的历史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后现代思潮未必正确,但新儒家应该从认识论上的乐观主义立场出发,正视和回应西方认识论革命所提出的问题。西方哲学强调“正确思考的规则”(rules of successful thinking),而中国哲学强调“总结所有相关考虑”,墨子刻教授希望二者通过交流比较和发展而实现唐先生所追求的“贯通”。墨子刻教授一向关注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注意回应和分析当代中国哲学界提出的不同观点,其对中国哲学界同人的不懈的热情关注和直率的分析讨论令笔者感佩。相信墨子刻教授的深入分析能推动中国学者的进一步反思和更严肃的创造。

以上墨教授以及劳先生所论都涉及“中国哲学”这一概念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歧义性。笔者的文章从唐先生就任中文大学哲学系讲座教授之讲词的主题开始,讨论“中国哲学”这一概念实有和应有的意涵。唐先生的讲词强调中国哲学的一个新方向即接受西方现代学术影响以后的客观研究的取向,并指出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传统中始终缺乏这一取向,直到清代才有了客观研究的趋势。这一取向要求我们以研究者的身份工作,而不是以哲人或圣哲的身份说话。唐先生谦称自己也是一个研究者。然而纵观唐先生的一生,特别是他的晚年,他显然主要在从事哲人和圣哲的工作。或许我们可以说,唐先生作为讲座教授,清醒地知道他应该是一个研究者,但从他的感情和本性来说,他始终服膺和践履的却是成德之教。这反映了“中国哲学”这一概念隐含的历史传统与现代

学术、成德之教与客观研究之间的紧张。由此可见,中国哲学实有现代学术与民族文化两重身份,从后者可产生生命导师之功能,从前者则可引出世界文化资源的功能。

中国哲学的主体是儒释道思想,因此本身与宗教传统有密不可分的渗透与融合。如果仅仅将中国哲学视为现代学科体系中的一支,就应该或必然忽略、贬低、剥离或排斥其与宗教传统的历史的血脉联系。如果将其视为民族文化进行客观研究,或努力继承之、发展之,就不能不正视其历史上的宗教元素。林维杰的文章就从气化与人文两方面对儒学的宗教维度进行了探讨。他先比较了唐、牟、徐的宗教观,指出“人文”概念为他们解释儒学宗教性格的共法,但唐先生对儒学的宗教形态和内容似乎更为宽容。他一方面认为人生之德行会决定死后为鬼还是为神,另一方面也强调后人对先人祭祀之态度是否诚敬孝慈,也会决定鬼神向上超度的力量和程度。林文特别指出,传统中将信仰对象与气化概念相结合造成了生人与神祇的同质化,同时也弱化了众神祇的主宰力和灵明性。

与林文比较相关的是吴启超的文章,他从唐君毅的鬼神论来解释儒家传统为什么认为仁心可以生出万物。唐先生认为,“仁心”不单对鬼神而言能创生、能使其存在,甚至能创生所有其“感通之所及”者。当然,这种创生非物理意义的生,这种使其存在的存在亦非知识或物理意义的存在,而是在仁心的关怀中存在。这与牟宗三的理论一致,即认为仁心确然具有一种创生力量,去成全其所感通关怀的事事物物为“真实的存在”。显然,唐、牟所说的创生与常识意义或经验科学意义的创生与存在截然不同。

黄冠闵的文章围绕主体性和主体之位展开,并比较了唐君毅与列维纳斯的理论异同和相互关系。作者认为二人的交会处在于由主体与他人关系所引发的责任伦理。列维纳斯不从自由意志的角度肯定主体性,而强调对于他人的责任才是主体之所以是主体而不可任意取消的关键理由。唐君毅则仍以主体意识为核心,但强调自觉的超越;他人是对主体我的限制,但此限制能作为感通的现实条件。二者有一明显分歧,即列维纳斯坚持神或无限者的超越性是不可及的远离,而唐氏肯定天心与人心、天德与人德的合一,从而人的有限性能借其自觉超越而接近无限。从以上林、吴、黄的文章来看,我们称唐先生为宗教家也不为过。

黄慧英的文章处理的是唐先生对病痛及苦难的体悟,也在某种程度

上涉及宗教层面。唐先生在病榻上不停地对生命课题进行反思,他曾担心自己意识太强而影响麻醉剂的效用,而事后则体会到个人意识能力的有限性。他还反想到:“求所以治病养生之道,是义;而必求病愈,则是利。”而“养病不求病愈,又正非易事”。黄教授的进路是将唐的生命体验与心理治疗相对照和比较,并提出“疾病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使我们变得完整”。

陈荣灼的文章从一个新的角度处理一个关于刘宗周的老课题。这新的角度在于(1)以唐先生的研究与牟宗三相比较与互补,(2)以刘宗周与 Michel Henry 相比较。陈的结论认为牟先生将刘宗周与胡五峰看做一系是成立的,而刘宗周与 Michel Henry 思想的相似可能引出研究宋明理学与现代思想的相关性这一新方向。

本辑另有四篇值得特别推荐的专题论文。戴璉璋先生的文章论述“忠”德义蕴的演变,证明从上古到秦汉以后,“忠”之义大致有二:一是上古政治体制中的臣子之道,即策名委质,至死不二;另一类型则是先秦儒家所讲习论说的待人处事之道,即诚身明善,从道守义。秦汉以后,两种类型掺合升降,演变为不同之忠的各种表现。戴先生的文章理据坚实,兼顾学与行,值得体味。

陈致的文章对影响深远的“孝”的概念做了追本溯源的工作,为哲学界、思想界研究“孝”之观念的演变提供了源头性的文献根据,值得参考。

陈继东的文章特别依据《馱书》初刻本详细地分析了章太炎早期思想中关于佛教的认识,对于我们了解章太炎本人以及近代思想演变之复杂多变提供了扎实的文献资料。

郭朝顺借重劳思光先生关于建立新基础主义的理论分析中国佛教的演变,可谓别具一格的观察,可以刺激我们进一步思考新基础主义的理论和佛教的演变线索。

本辑各个专栏都有令人欣喜的内容。“观潮屿”发表了 Martin Powers(包华石)教授为本刊特别撰写的关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唐君毅讲座成立的原委,此一历史文献可谓中西学术交流史上的重要一页,也可看做中西哲学平等双向交流的一个里程碑。“学思录”刊载了笔者对孟旦教授的采访,内容涉及他本人数十年的经验和体会、中国哲学特有的

课题与难点、中西方学术界的重大思潮,以及他近期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内容广泛而语气轻松,相信读者会从愉快的阅读中获得不少教益。“会议录”是关于本中心召开的“儒学:学术、信仰和修养”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报告,我们感谢与会者的参与和李兰芬教授的热心报道。“回音谷”是孟旦教授对墨子刻教授的第三次回应,以及笔者对吕锡琛教授的回应。“回音谷”是沟通作者和读者的桥梁,希望有更多朋友利用这一桥梁进行交流和讨论。

从本辑内容来看或仅从对唐君毅的研究和介绍来看,“中国哲学”这一术语就容纳了许多不同的内容、兴趣、方法和关切。这中间涉及了多种不同或冲突,如忠实、客观地了解认识已有的哲学思想与继承发展或修正批评已有思想的不同,将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与将之作为民族文化或个人修身之资源的不同,注重弘扬和发展中华文化传统与推动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不同。就唐先生本人一生学术活动来说,也存在着作为一个研究者与作为一个哲人的不同,作为新方向的提倡者与传统使命的承担者的不同。认识到这些不同可以让我们的研究工作更自觉、更深入、更加色彩鲜明而艳丽,也才可能有不同取向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相得益彰。否则,混沌一团,毫无自觉,则既不能充分地弘扬传统,也无法有效地建设新学科。此意是与不是,望同人三思。